



ZHONGGUO
ZANGDI KAOGU



中国藏地考古

八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天地出版社

中国藏地考古

(第八册)

综合研究编·研究综述





西藏考古工作40年·····	2492
西藏考古与西藏古代文明——献给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	2505
西藏考古综述·····	2514
西藏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	2529
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	2541
20世纪西藏考古的回顾与思考·····	2554
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奠基之举与历史性转折——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2567
考古学所见西藏文明的历史轨迹·····	2577
西藏考古新收获与远古川藏间的文化联系·····	2590
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	2599
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兼论高原古环境对石器文化分布的影响·····	2612
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	2631
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	2640
略论西藏的细石器遗存·····	2654
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原始文化——西藏考古新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初论·····	2662
从卡若到曲贡——西藏高原新石器文化简论·····	2672
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纪念昌都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0周年·····	26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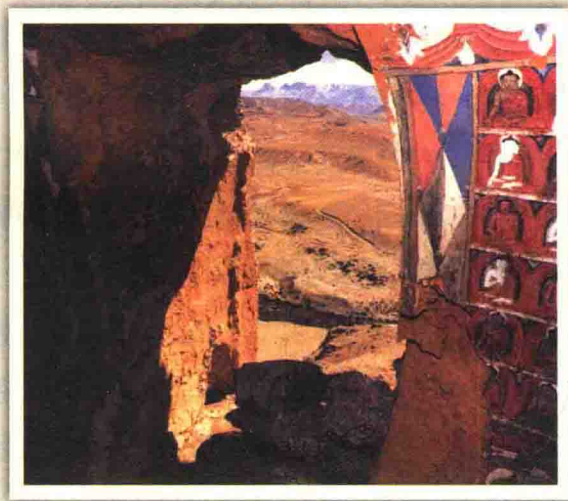


青藏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2706
青藏高原远古葬俗的考古新发现·····	2722
青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	2724
青藏高原古代墓葬的初步研究·····	2742
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卡孜河谷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2762
西藏西部阿里丁东遗址相关问题初探·····	2824
西喜马拉雅地区立石遗迹初论·····	2839



早期吐蕃墓葬

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青海省大通县境内的一处吐蕃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墓葬位于大通县境内，是一座典型的吐蕃墓葬。墓葬的入口位于山体的中部，入口处有一个由红、黄、蓝、绿等颜色组成的布幔装饰。墓葬内部空间狭小，墓室由土坯砌成。墓室内发现了一些随葬品，包括金、银、铜、铁等材质的器物，以及一些生活用品。这些随葬品的发现，为研究吐蕃人的丧葬习俗、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此外，在青海省大通县境内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吐蕃墓葬。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与上述墓葬相似，但规模较小。这些墓葬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吐蕃人在该地区的活动。通过对这些墓葬的研究，可以了解吐蕃人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情况。吐蕃墓葬的研究对于了解吐蕃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藏考古工作40年

夏格旺堆（西藏博物馆）

普 智（西藏罗布林卡管理处）

1959年之前，西藏没有文物管理机构，考古工作的开展主要由一些西方学者进行，并且仅限于地面遗存的调查和观察记录。1959年西藏平息叛乱不久，成立了“中共西藏工委文物古迹、文件档案管理委员会”，下设文物管理小组，这是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前身，也是西藏最早的文物管理机构。1964年，在西藏工委文物管理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组。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不久，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且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文物工作方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1965年成立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机构一直担负着安排全区文物考古的行政管理和业务工作的重要角色。由于新时代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1995年对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调整、充实后，成立了西藏文物局，直属单位有布达拉宫管理处、西藏博物馆、西藏罗布林卡管理处及西藏文物商店。目前，西藏五地区一市都成立了文物管理机构，并且在札达县等文物古迹数量较多和工作开展较好的县里，也成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西藏考古工作者从内地各大专院校毕业，充实到西藏考古队伍以来，国家投资委托内地专业院校，举办了大专以上学历的西藏文博班2个，专门为西藏培养了60多名专业人才。除此而外，从内地专业院校毕业的汉族和藏族专业人员，也先后投入到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队伍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西藏文物考古队伍中的骨干。

20世纪50年代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半个世纪、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通过综合与专题结合的考古调查，在西藏区域内发现了内容丰富、种类齐全的古代文明遗存。这些发现，不但对研究西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特殊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人类文明及其人地关系等具有世界性学术研究价值的重大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到目前，西藏区域内发现的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及岩画、近现代重要史迹等各类文物点已经超过2000处。值此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简要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西藏考古



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以致贺并祝愿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在新时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一、石器时代

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先生在藏北那曲采集到了一件细石核，这不仅是西藏区域内首次发现的细石器，而且对认识西藏高原的石器时代文明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它开了西藏史前文明研究的先河。随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那曲和藏西阿里等区域内，相继发现了5个旧石器地点和几十个细石器的采集点。20世纪70年代，继在西藏西北部发现旧石器和细石器后，在藏东南和藏东又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到了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陶片等。这些遗存的发现，首先改变了西藏石器时代文化的保存状态，即由原来仅从地面采集转为具有明确的层位关系；其次更加丰富了遗存的种类、内涵，逐渐呈现出西藏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性特征和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再次，不但在空间分布上有所扩展，而且在研究的科学性上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提高，为了解和研究西藏石器时代的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状况，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发现更有科学依据的实物资料。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区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在西藏区域内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存地点更是数以百计，几乎遍及全区。不仅地面采集地点的分布得到空前的拓展，具有地层依据的石器遗存也开始多了起来，而且对了解石器时代区域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及其流变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依据，把西藏考古工作与研究推向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新的发展阶段。

（一）旧石器时代

目前，西藏区域内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有8处，藏南定日县的苏热，藏北申扎的珠洛勒和多格则，藏北班戈色林错东南岸的各听，藏西日土的扎布和夏达错东北岸，藏南吉隆的哈东淌和却得淌。在上述8个地点中，后3个地点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西藏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其余部分都为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由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的。由于对这些被发现的旧石器的特征描述、类型划分等方面的内容已有详尽的介绍，在此不作过多的重复。

关于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年代问题，目前仍然在讨论当中。由于此期石器缺乏明确的层位关系，即使通过石器类型的比较和采集点所处环境的地质地貌特征等来进行分析断代，认为西藏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年代至少应在距今5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但这种断代方法均属间接断代法，难免存在着诸多可质疑的地方。所以有学者提出：“青藏高原所发现的旧石器，无论石料选择、器物形制和大小，以及加工技术等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细石器特征。由此看来，青藏高原的旧石器从类型学上也许可以划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范围，但其绝对年代是否在1万年以前，尚

需今后的进一步科学测定。”以上这两种观点的提出，显然是各有各的依据，但我们通过比较认识到，要想真正解决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年代学问题，还需要发现和发掘具有明确层位关系的文化遗存。而要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不仅仅局限于发现一两座具有层位关系的遗址，它们还应当能够反映出石器工艺传统和内涵在区域文化中的形成和传承的尽可能全面的特征。

除此而外，石器工艺传统与渊源是包括细石器在内的西藏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另一令人关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前，许多研究者将西藏旧石器的工艺传统和渊源都与我国华北旧石器系统联系在一起，认为“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不仅可能与我国华北、西南及东南亚旧石器文化发生过交流，而且与喜马拉雅南侧旧石器文化的发生交流在这一时期也是完全可能的”。与上述看法不同的观点认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明显呈现出细石器特征，可能在旧石器时代或全新世以前，青藏高原尚无人居住，尤其在其腹地的西藏区域。自全新世以后，很可能是分别来自华北和华南的两支移民进入青藏高原，并带来了与之相应的藏北和藏南两个不同传统和类型的细小石器和细石器工艺，而青藏高原与北方草原和南亚诸地的交通和文化往来恐怕至少是卡若和曲贡文化以后的事了。

不难看出，西藏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的判定，石器工艺传统及其渊源的研究，石器年代的科学测定等问题，不仅成了研究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同样关系着石器时代人类是如何形成、开发和创造了最初文明于这片高天厚土的问题。尽管目前我们仍很难回答上述问题，但客观上讲，正因为有了这些问题，所以才不断地推动着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前进的车轮。

（二）新石器时代

由于西藏区域内发现的具有层位关系、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都是晚期的遗存，所以西藏的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替是如何产生的，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而言，学者们将发现于藏西北（即藏族传统地理划分中的“羌塘”和“堆”）的，不见陶器、骨器、金属器及大型打制石器，而以细石器及小型石片工具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大致认为是代表西藏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文化，并冠以“藏西北文化类型”，其时代大约距今7500~5000年，经济类型以狩猎经济为主。自此以后的考古学年代的遗址有卡若（karub）、曲贡（Qukung）、小恩达（dngulmdav）、邦嘎（banga）、昌果沟（Changuo Gou）、达龙查（stag-lung-brag）等，另外有林芝县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和拉萨纳金等地，以及墨脱县区域的7处采集点等。晚期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5000~3000年。

除了这些具有地层依据的遗址外，高原上大量发现的细石器采集地点是西藏石器时代文化的又一显著特点。截至2005年，加上前面两个统计总数的70处，细石器地点已经达到102处。其中2000年全区文物补复查中在藏北申扎县发现1处，2002年“藏北无人区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6

处，2003年“青藏铁路西藏段考古勘探项目”中发现18处，2004年“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中发现4处，2004年配合西藏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卷的编写而进行的阿里地区文物调查中发现3处。这些细石器的发现，虽然很多尚未研究透彻，但给西藏石器时代增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在上述这些遗址中，对卡若、曲贡、邦嘎、昌果沟等地做过相对较多的工作，由于这几座遗址是学术界较熟悉且有较多已刊布的介绍文章，所以在本文中除了对这些遗址开展过的新工作情况做必要的介绍外，只选择一些大家不是很熟悉和新发现的遗址、石器时代文化地点做相应的介绍。

1. 西藏东部和东南部，主要为昌都和林芝

这一区域早先发现的遗址和新石器时代采集点有昌都地区的卡若、小恩达、烟多，林芝的云星、居木、加拉马，墨脱县区域的7处采集点等。除此而外，近期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昌都江钦遗址。

林芝地区发现的云星、居木遗址，加拉马和拉萨纳金公社采集点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基建过程中被推土机推出来的。由于纳金公社采集点在公社北侧的山坡上采集到了少量的夹砂褐陶和红陶片之外无其他遗存，所以其文化内涵并不清楚。以上遗址和采集点目前还没有开展科学的发掘工作，但从包括墨脱县区域内当地群众开荒种地时捡到的石器及陶片来看，并不能忽视地方性文化的诸多特征。

1977年至1979年对昌都卡若遗址进行的科学发掘，不但为西藏石器时代考古，而且首次为西藏史前文化的内涵、区域特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具有地层依据的实物资料。卡若遗址独具区域文化特征，学者们把文化内涵、特征等方面有相同特征的小恩达等遗址一起命名为“卡若文化”。时隔23年之后，2002年10月至11月期间，为制定“昌都遗址保护规划”，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其目的在于确定遗址分布范围、重要遗迹区位置及遗址的保存现状。此次揭露面积为200多平方米，发掘中清理、发现各类遗迹21处，其中房屋遗址3座、灰坑16座、道路1处、水沟1条。出土各类遗物7000余件（片），其中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1000多件，陶器残片1200多件（可复原3件），骨料、骨块4000多件，重要文物100余件。通过此次发掘证实，在原保护区西侧、东侧仍有原生文化堆积分布，其总面积应在1500平方米以上，遗址东部应保存有房屋遗址、灰坑、道路等重要遗迹，结合其他因素，原遗址的保护区面积约在2000平方米。

2000年为了补充《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分卷》和《西藏自治区文物志》的资料内容，西藏文物局组织四川大学、西藏博物馆和山南文物局等单位的专业人员对西藏“五地一市”开展的文物点的补查和复查项目中，在澜沧江



图1 2002年卡若遗址T3发掘场面（李永宪摄）



支流麦曲河畔发现了察雅县江钦遗址。该遗址是藏东三江流河谷地区继卡若、小恩达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大型史前遗址。有学者认为,在遗址采集的打制砍斫器、盘状器、夹砂陶器残片和地面残留的烧土建筑遗迹等,再次证明横断山脉的河谷地区不但是高原史前文明居民最为集中的文化区,而且是西藏山地农业起源最早的区域。

2. 西藏中部,主要为拉萨、山南和日喀则

目前在日喀则区域还未发现具有地层依据的石器时代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存绝大多数为地表采集点,尤其分布在日喀则西部各县为其特点。然而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该区域史前文化的实际情况,也许可能与我们目前开展的工作侧重点以及力度相关。拉萨曲贡不但是西藏腹心地区的一处史前遗址,而且与昌都卡若一起,作为阐释西藏史前区域文化特征的典型遗存和认识。由于该文化遗存所反映出的区域性文化特征与山南的邦嘎、昌果沟遗址相近,所以将它们一起看作“西藏腹地一支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这一文化被命名为“曲贡文化”。

达龙查遗址是在1990年的文物普查中发现的,位于堆龙德庆县乃琼乡达龙查寺西南约1公里的山脚下,地貌为洪积扇,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当时主要对遗址中的两座平底窖穴做了试掘清理,出土石制品20余件,分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类。陶器残片可分夹砂和泥质陶,多见夹砂红陶,夹砂褐陶次之,另有夹砂和泥质的磨光黑陶。与上述遗物相伴的兽骨多属牛、羊、马等。“出土物的诸多因素与拉萨曲贡遗存十分相似,推测二者可能属于同一文化类型,时代也可能大致相当。”

邦嘎遗址位于山南地区琼结县下水乡区域,现存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遗址呈条状形分布,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30米,海拔3900米。1985年7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普查队员在遗址南端靠近冲沟断崖处揭露总面积为50平方米,发现石框灰坑4个,灰坑形制为长方形和圆形两种,最大面积0.5平方米、最小面积0.2平方米,所有灰坑都用石料做边,且与坑壁平直,石料分卵石和片石,灰坑深度在0.1~0.25米,内均填有深灰色土,出土兽骨、木炭、陶片等。另外在遗址中出土磨石、石磨盘、重石、石球等石器数件。虽然没有出土完整的陶器,但出土了2000多片陶片,同时有大量动物骨头的出土。2000年至2002年的3年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博物馆及山南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3次发掘。通过发掘,该遗址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一座半地穴式房屋,灰坑十几座、灶膛两座和较晚期墓葬一座等,出土遗物有石器(以石磨盘和磨棒为主)、陶器和少量的骨器。房屋的发现,为西藏中部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发现,其意义非常重大。房屋开口于早期地层第4层之下,平面形制为圆角近方形,长宽6米×6米,墙壁残高0.2~0.4米。屋内发现大小灰坑9座。这几座灰坑基本位于房屋的中部靠偏北,且直接打穿了没有文化堆积的生土层。发现的石器中以磨盘和研磨器为主,具有地方特色。少量陶器的特征,与拉萨曲贡、山南昌果沟等遗址出土的陶器属于同一种陶作工艺。

2003年6月,青藏铁路沿线的考古调查中,堆龙德庆县古荣乡区域内的嘎冲村(dgav-grong)附



近发现了一处上限可能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晚到早期金属时期的古遗址。这处古遗址中发现少量的打制石器、夹细砂红陶片、黄褐陶、磨光黑皮陶及铁渣子等。2005年5月对该遗址进行的简单调查中，在距地表深度约1.5米处的断崖剖面暴露有夹砂红罐口沿、黑皮陶和褐红皮陶以及灰陶，少数陶片上还有刻画纹，另外在遗址的北面一坡地采集到了一件涂红色的砾石砍器。从发现的这些遗物及遗址断面的石构遗迹，在遗址东北面的断面中发现的人骨及可能为其墓葬结构的石块等来看，该遗址的内涵当不会较为单一，从时间的延续性来看，也可能上限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晚至吐蕃时期。文化性质基本与以拉萨曲贡为代表的西藏腹地的邦嘎、昌果沟等遗址相近。

正如在前文中所述，通过全区文物普查，仅在1990年日喀则西部各县就发现了近30处的细石器采集点。由于文物点的数量众多，在此不可能做更加详细的介绍。但这些石器采集点“对于继续深化对西藏高原细石器文化渊源、传承问题的认识，无疑会产生强烈的影响”。

3. 西藏西北部，主要为那曲和阿里

西藏西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采集点的最早发现，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的综合科学考察中。这段时间发现的采集点，已经有学者归类为“不见陶器、磨制石器，只见细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或单纯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特点”，主要有藏北黑河（那曲）的1个地点，藏北申扎、双湖的18个地点（其中的珠洛勒地点不但有旧石器，而且也是较为典型的细石器采集点），班戈县的才多茶卡、蒂让碧、雅曲雅土、错尼地点，普兰县的玛法木（旧译马法木）湖东北崖地点，日土县的帕也真沟地点。

自此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到中期，是这一区域内发现石器采集点的第二阶段，主要得益于全区文物普查项目的开展。这一阶段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发现了10处采集点，分打制石器和细石器采集点两类，较为典型的细石器采集点要少于打制石器采集点。而那曲地区，没有新地点的发现。

1994年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全面结束后迄至目前，西藏文物考古的重点也开始移向区域性文化的调查、研究、保护等项工作中，结合这些项目的开展发现了一批新的石器采集点。这段时间发现的新的采集点总数也近50处，可以认为是这一区域石器采集点的第三阶段。

2000年全区文物复查项目中，在申扎县内发现了2处石器采集点，即达卓与乃那农沟石器地点。前者位于雄梅乡三村东北约2公里处，海拔4390米。采集标本60余件，标本均为黑色石材，本地及附近地点不见该类石材，标本均为石片打制，器形较小，器型有刮削器、切割器等，刃缘部有明显的因使用而留下的疤痕。时代大约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后者位于买巴乡一村南约15公里的乃那农沟的西侧缓坡上，海拔4750米。标本均为红褐色石材，包括细石叶、细石核等，石核有指甲盖形。器型中有一种呈三角形，顶端尖锐、锋利，可能是用于钻孔的工具类器物。与细石器一起，还采集到夹细砂红陶片，其时代当在新石器时代。

2002年藏北无人区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石器采集点9处,其中6处是细石器采集点,3处是以细小的打制石器为主的采集点。所有采集点不见陶器、磨制石器,更不见金属器。区域上可分“无人区”和“有人居住区”两种,海拔在4720~5020米,在“无人区”内发现的石器点有5处。其年代大约在距今7500~3000年。

2003年对青藏铁路西藏段的调查中,共发现石器遗存地点27处。那曲地区安多县内的采集点为15处,其中10处是细石器工艺采集点,其余为打制石器采集点;那曲县内为7处,其中5处是细石器采集点;当雄县内为4处,除1处外都是细石器采集点;堆龙德庆县内、拉萨市对岸拉萨河崖的拉觉发现1处打制石器采集点。除了当雄县加日塘地点通过发掘确认为一处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及采集的研制品2600余件外,其余26处均为地表遗存地点,这些点上采集石制品1098件,其种类包括石核、石片(石叶)、工具以及碎片断块等。绝大多数石器地点分布在河流两岸的一、二级阶地和湖滨丘地上,属中小型石片石器类型、细石器与石片石器共存类型。尽管当雄县加日塘遗址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拉萨市,但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此也归入到本文划分的区域内做简要的介绍。

加日塘(lcags-ri-thang)遗址位于当雄县羊八井镇桑巴萨乡切隆多村西南约200米处,海拔4234米。从2003年6月至2004年4月,陆续进行了3次发掘,共揭露面积2902平方米,采集和出土近2600件遗物,其中石制品占绝大多数,陶片及其他遗物较少;发现并清理火塘遗迹、灰坑遗迹各1处。

该遗址出土石制品特征比较明显。细石核剥离痕迹清晰有序,形制规整,表现出精良成熟的技术传统;细石叶形制规整,个体小巧,最小的仅有2毫米宽、6毫米厚,刃部锐利。磨制石器很少,主要是穿孔石球和一面带凹窝的磨石两种。遗址出土的陶片少且碎,经过拼对修复,可辨认出其陶系主要是夹砂黑陶及夹砂灰褐陶,均为手工制作。可辨器型主要为罐,其口沿和肩部往往施细绳纹、刻画纹、戳印纹、附加堆纹等组合的装饰纹,不少器物口沿的唇部饰有类似细绳纹的划纹,少数素面陶片外表有磨光黑皮。陶器的这些特征十分清楚,且与迄今所知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均有不同,具有明显的特色。综合各种因素,似可将加日塘遗存命名为“加日岗文化”(lcags-ri-sgang),它很可能代表藏北与西藏腹心地区接壤地带的一种晚期新石器文化类型。加日塘遗址是西藏首次正式发掘的、以细石器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游牧部落遗址,其面积较大,出土遗物数量较多、石制器种类亦较丰富。通过进一步研究,对于建立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区系类型,研究藏北高原区新石器时代原始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环境变迁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参考有关C¹⁴测年数据,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3200~2900年。

2004年为配合西藏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卷的编写而进行的阿里地区文物调查中总共发现石器采集点7处,除了3处属于细石器采集点外,其余为打制石器采集点,并且以石片石器为主,只有细石器的工业传统。其中1处为石器原料产地兼加工点。



二、早期金属时代

西藏考古文化中的“早期金属时代”这个分期概念，最早由童恩正先生提出，这一时代的时间范围大致推断为前1000年至6世纪的吐蕃王朝兴起之前。就目前而言，这种分期法确实存在着较多不确定的因素，然而在西藏考古学文化上还没有更加准确的分期命名之前，这一方法仍然具有可行性。属于这一时期文化遗存的主要内容有金属制品、大石遗迹或巨石文化、岩画等。本文中根据时间范围，对属于这一时段的各类文化遗存及其新的发现做简要介绍。

（一）金属制品的发现与研究

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金属制品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个别发现与传世品的收藏和研究，以小件青铜制品托架（thog-lcags）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西藏高原时期金属制品的工艺特征、艺术风格、文化含义等方面的内容，但对这些作品的年代仍不能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尽管在西藏区域发现了大量的各类古代文化的遗存，但相对而言金属制品的发现仍显贫乏，而且在其年代学的研究上比起其他类遗物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1990年至1992年的曲贡遗址发掘中，在早期文化遗灰的灰坑H12中出土了1件扁平叶片形的铜镞，经金相观察，铜镞为标准的锡青铜组织，其材料为冶炼所得，成型采用的是铸造方法，而不是锻打。据此有学者认为，遗址绝对年代大体在距今3500~3750年，考虑到测得的上限年代可能并不是最早年代，其上限年代或可推到距今4000年前。他们所拥有的青铜冶铸技术，说明了遗址文化的创造者已经迈进了青铜时代的门槛。这一发现和研究不新，但为西藏早期金属制品的技术、渊源等方面提供了更加科学的依据，而且可以重新审视1925年至1928年中亚考察队的罗列赫（N. Roerich，又译为劳瑞茨）在藏北高原的霍尔（hor）、南茄（nam-ru）和那仓（nag-tshang）等地石丘墓葬中出土的青铜三棱镞、叶形铁镞等的研究工作，从而为进一步探索西藏早期金属制品的时空架构的基本情况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除此而外，在曲贡遗址晚期文化遗存的土坑石室墓M203中出土的1件铁柄铜镜有相似之处，但纹饰图案尚有较大差异，两鸟相向而立的形象与地中海西部巴拉瑞克岛遗址出土的陶鸟有些相似。在这点上，学者们有着较为一致的认同，即认为曲贡带柄铜镜的形制特点属于“西方带柄镜系统”的遗物。然而，“曲贡出土的带柄铜镜与斯基泰文化带柄镜比较，个性大于共性，与南亚次大陆北部的印度古文化更为接近”，从而提出曲贡遗址带柄铜镜可能来源于南亚次大陆，或者有可能来自中亚的观点。而且，根据与西藏周边地区如新疆等地出土的相同或相似遗物已知的年代数据的比较，将曲贡遗址带柄铜镜的年代大致推断为前8世纪。

除了曲贡遗址的发现外，西藏中部的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发现的贡布学乡查加沟和多却乡区域的2

座墓葬，给进入21世纪的西藏考古又增添了新的意想不到而重要的实物资料。这2座墓葬都是当地群众发现，并由山南文物局专业人员参与相关工作的。查加沟墓葬于2000年发现，2001年清理。墓葬地表无明显的封土堆，由于洪水冲毁严重，为详细的墓葬形制结构的判断带来较大难度。从残存的砾石围砌梯形边框判断，墓葬的一边长应在7米左右。根据清理情况，大致可判断其形制应为砌石边框的墓葬。墓葬出土的遗物种类有黄金制品、铜饰、石串珠、贝饰、铁质武器、陶器、丝织物等108件（片）。多却乡区域墓葬于2002年被当地群众发现。由于墓葬所处地点受到较大的山体滑坡、雨水冲垮等自然因素的破坏，给寻找墓葬准确的位置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从墓葬现存葬具、结构、葬式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其葬具应为一独立的木棺材，似无头箱等其他结构，葬式为仰身直肢葬。从墓主人的骨骼特征判断，可能为女性。墓主人仰卧于木棺材之内，其额部有一黄金制作的圆形装饰物，厚约0.15厘米（2001年查加沟简报中认为，此种金制品为“圆形盔饰”，但从2002年清理出土同样实物的现场情况看，此类金制品应为妇女头顶的装饰品，而非头盔的饰件）；面部罩一层薄金片；颈部有好几排环绕的用金子、珊瑚及玻璃器等制作的装饰品，其中最精美的是用黄金做成盘羊造型的小件装饰品，有十几件，应为牌饰，与2000年发现的马形牌饰属同一种用途；在身体右侧腰上系挂的1件青铜短剑，一直垂到膝盖部位。另外在墓主人的头部背后发现1件金管，直径约2~3厘米，长度约13厘米，估计这件金管为束发之用（2001年的简报中认为这是一件头盔上的装饰物，但从此次发现来看，它应为脑后长发的束发装饰）。

从上述2处墓葬出土的遗物特征来看，其年代可能早至距今2000年前后，与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系统早期金银器的时代应当是在大体相同的一个年代幅度内，如将其比定为相当于中原王朝的汉晋时期，当无大误”。浪卡子县内的2处墓葬的发现，无论在随葬品种类的丰富上，或在金属制品的数量上，甚至可能在葬具上都属于西藏考古发现的首次，为研究和探索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文化内涵、性质，乃至中原、草原游牧民族的早期文明特征等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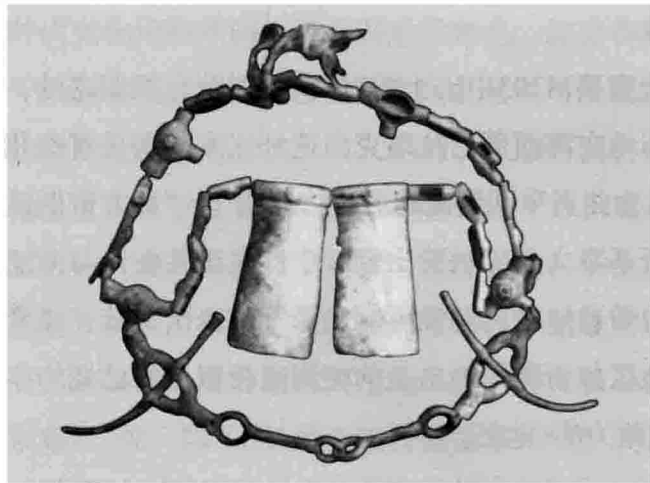


图2 马头套具

除了以上这些西藏中部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金属制品外，在西藏的西部、北部和东部也同样能够发现属于这一时间范围内的金属制品。

1999年阿里札达县皮央·东嘎（phyi-dbang-dung-dkar）遗址的古墓群发掘中，出土铜器13件，包括青铜剑、片状器、环饰、扣饰与泡饰。该基地的 C^{14} 测定年代范围为距今2725~2170年，相当于中原王朝的秦汉时期。其中编号为PGM6:4的青铜剑保存较完整，其



形式与云南剑川鳌凤山早期墓地出土的I型剑非常相似，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值得关注。2002年昌都卡若遗址保护规划项目中，在卡若遗址附近的热底垄（rag-ti-lung）山腰发现墓群的墓葬02XCKRM5中，出土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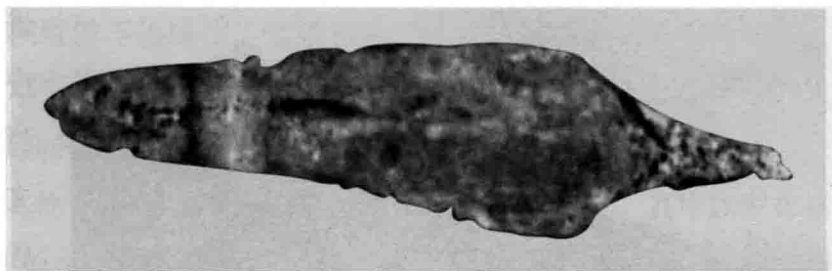


图3 红铜短剑

件铜刀，墓地测定年代约距今2400年。另外，2002年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者约翰·文森特·贝勒扎（John Vincent Bellezza，又译为贝勒沙）先生捐赠了一套在藏北发现的较完整的马具头套及红铜短剑，这件马具头套由大小不一的各种配件35件组成，其中衔、镮为红铜，其余为青铜。尽管这套马具及红铜短剑没有具体出土地点和其他伴生品，但从其特征上基本能确认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作品。

（二）大石遗迹或巨石文化

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人罗列赫与意大利人杜齐（又译为图齐）等人曾经对西藏的大石遗迹或巨石文化做过相应的介绍与研究，对世人认识这种文化遗存做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中国学者对这种遗存的记录始于1990年的西藏文物普查项目的开展之后，主要的发现有萨嘎独石遗迹、昂仁石圈遗迹、措美石圈遗迹、浪卡子列石遗迹、双湖帕度湖石坛遗迹。

自此之后，2001年的藏北高原无人区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4处，2002年与前述相同项目中又发现8处，2002年西藏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合作的象雄文明遗迹考察项目中那曲、阿里域内发现10处，2003年的青藏铁路西藏考察项目中那曲域内发现2处，2004年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中札达、噶尔县内发现3处，2004年配合西藏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编写的调查中发现25处列石、石圈遗迹。另外，还有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者约翰·文森特·贝勒扎在近几年的藏西北和日喀则西部的调查中发现的130余处。从上面一些简单统计来看，大石遗迹文化地点的数量不到200处。但若细分，肯定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的。就此而言，与以往相比，目前所掌握的关于大石遗迹文化地点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仅是专业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而且也与那些热衷于保护和研究此类文化遗存的所有学者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是分不开的。

大石遗迹文化内涵丰富，性质和遗存结构相当复杂。从地面形制特征来划分，有单纯的列石、独石，单纯的石圈或石框，列石与石框或石圈结合，列石与石框以及石片图案结合，立石（或石柱、石碑）与石框结合等。从功能上划分，大致推断为祭祀供神类、纪念或标志类、镇慑降伏类等。相对而言，功能上的划分还是有待于大量的考古发掘及其研究，才可能有更深入的进展。

比起以往的研究，近几年在认识大石遗迹文化遗存的内涵、性质、分类及命名方式上得到了



图4 2002年发现的次玛绒“门突尔”

进一步的深入。例如，过去相关的记录中，对大石遗迹文化的遗存并没有沿用当地居民的称谓去概括，仅采用“巨石文化”、“大石遗迹”等概念，用当地居民的称谓可能更适合于区域性文化特征明显的此类遗存的概括，也是比较符合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方式。就此而论，大石遗迹文化也不一定都属于“门突尔”文化的系统之内。二者的性质、功用、族属等一系列内容的异同，将有待于今后科学研究的鉴别和验证。

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表明，和所谓的大石遗迹并存的往往有与墓葬、祭祀、城堡、修行场所（洞）等相关的遗存，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时空关系的考察，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此类遗存的实质。不但如此，在空间的分布上也具有相当鲜明的特点，即这些遗存主要分布于西藏西北部与西部，是为藏族传统地理划分中的羌塘（byang-thang）和堆（stod）。而这一地理范围，恰恰与文献记载的象雄王国领地相对应，这种关系的显露就不能用偶然的巧合来解释了。所以，至少在目前而言，我们可以将与巨石文化相关的一系列遗存，比定为构成象雄文化内容的重要部分来进行考察。同时不能忽略的是，这一地理范围又是众多游牧部落及其文明相互交融的大舞台。在文化、社会和经济的考察中我们需要站在游牧民族特有的生存环境及其独特的社会结构的高度来考虑和分析各类遗存。

（三）岩画

截至1994年，青藏高原共发现古代岩画地点近60处，主要分布于羌塘和堆，藏东和藏南也有极少量的发现。西藏岩画的制作方法主要有凿刻和涂绘两种，一般而言，前一方法主要见于中国北方系统的岩画，而后一方法主要见于南方系统的岩画中，常见题材有与狩猎、畜牧、征战及演武、神灵崇拜、舞蹈、动物等相关的内容。这些岩画的制作方法、题材等方面不仅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特征，而且与中国南北方乃至南亚印度北部的岩画有着相似或相近之处，为研究西藏远古社会的文明提供了一个新种类的重要素材。

2001年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的“藏北高原无人区综合科学考察项目”中，在那曲地区尼玛县的夏桑和加林山地点新发现了2幅车辆题材的岩画，这一发现不仅是西藏区域内的首次，而且丰富了整个青藏高原岩画的题材。过去，在青藏高原的岩画中发现车辆仅有2例，地点在青海的



庐山和野牛沟。对于青藏高原岩画中发现的车的属性，已经有学者认为“肯定不是羌或吐蕃人，而是一种外来文化因素”，属于北方草原文化进入青藏地区的一个例证。如此看来，尼玛县内发现的2处车辆题材的岩画，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

2004年配合西藏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卷的编写项目中，新发现了5处岩画地点。其中以罗布错环湖分布的3处岩画点最为突出，有些画面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叠压和打破关系。早期岩画中出现的列石（或立石）图案和牦牛交媾图为以前所未见的题材，一些鹿的造型与新疆的“鹿石”和斯基泰金属牌饰上的造型极为相似。

另外，2002年西藏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合作的象雄文化遗迹考察项目中对那曲申扎县内的6个岩画地点和阿里改则县的1个点做了记录，并以较为坚实的西藏宗教学知识作为背景，对岩画中各种符号所表达的含义提出了一些独到而新颖的见解。更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岩画点的地名都采用汉藏对照的方式来做了记录，这种方法值得被今后的包括西藏考古学在内的田野调查所借鉴。

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还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墓葬及其随葬遗物、建筑遗址、洞穴遗址等，其发现的数量也相当可观。近年新发现的遗存有1999年皮央·东嘎遗址群内的萨松塘（sa-gsum-thang）等3个墓群共107座墓葬、殉马坑1座和列石遗迹1座。2000年全区文物补复查中昌都县沙贡乡发现1座砌石结构的古墓葬，墓中出土有10余件带器耳（提耳）的装饰有绳纹的陶罐和陶杯。这种器型与以往昌都地区古代墓葬中的出土物不同，测定年代约为距今2000多年。2001年皮央·东嘎遗址群内的丁冬（ting-dom）房屋遗址，除了其建筑为遗址群增添了新的内涵外，还发现了炭化大麦（青稞）及蔬菜种子，年代约为距今2065年；2004年“象泉河流考古调查项目”中对新发现的噶尔县门士乡（mon-mtsher）的卡尔东遗址群、泽蚌（rda-spungs）遗址群和查库尔（khra-gur）墓群、纳恰（rna-cha）墓群的近200座墓葬等遗存进行了调查和试掘，为探讨这一区域的象雄文明相关问题提供了较为详尽的考古学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对属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文化分期上，习用“前佛教时期”这个概念来进行概括，这可能出于国内外学者对西藏远古文化方面存在理解上的差异所致。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对西藏远古文化的各种类型遗存进



图5 纳恰墓葬群M25（N-S）清理后的情况